

陕甘宁边区的 图书馆事业

任继愈题



赖伯年 主编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九五」(96)年度项目
陕西省优秀科学、文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賴伯年主編

圖書館

陝甘寧邊區的 圖書館事業

任繼愈題



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

主 编：赖伯年

副主编：白春梅 杨邦俊

出版发行：西安出版社

社 址：西安市长安北路 34 号

电 话：(029) 5234426 5253740

邮政编码：710061

印 刷：陕西省乾兴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1.5

插 页：8

字 数：290 千字

版 次：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500

ISBN 7-80594-516-0/G · 326

定 价：25.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请寄回另换。



1997年是延安中山图书馆成立60周年，曾在该馆工作的部分在京人员欢聚一堂。
(右起：古天佑、王仲方、武衡、史洛明、于光远、武衡夫人、古天佑夫人)

为创办延安中山图书馆
出过力，永远是外侨生
命中珍贵的一页。

王仲方
史洛明
九九年四月

原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仲方和夫人史洛明曾共同在延安中山图书馆工作。这是他们给本书的题词。



陕甘宁边区一些图书馆收藏的马恩列斯著作



陕甘宁边区一些图书馆收藏的毛泽东、刘少奇著作和部分革命文艺作品



延安中山图书馆旧址

陕西延安中山圖書館啓事

逕啓者同人等對於 中山先生之偉大人格與救國主張其無上崇敬。對於 先生創立之三民主義。一取法於解放之民族主義。實現民主自由之民權主義。改善人民生活之民生主義。一上本探信且救國之唯一鐵軌。

同人等爲紀念偉大救國領袖起見。自成立在邊陲荒僻長江一切障礙之過程中應有文化上理論上武裝民衆團體。遂發起中山圖書館於陝西之延安。廣爲蒐集中山先生遺著。函。長。表有關係一切著作以及關於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科學史。哲學與自然科學之中外書籍。俾對中山先生之救國學說有深刻之研究與宣傳。而更能觀其具體抗日鬥爭之武器。

雖館館成立伊始。經費力薄。且處於偏僻之延安。一切文化之設施與大書積之蒐集。困難良多。用敢申請全國各文化團體。無國團體與各機關先生。對於陝西與各方面與援助。庶幾捐助各種書籍。以及雜誌報章。則不特館份之幸。亦救國前途之幸也。

如蒙捐助寄報或賜以指教。請逕寄陝西延安中山圖書館收。爲此佈告。

理事會 董必武 林伯渠 徐特立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五日

延安中山圖書館發起啓事



「抗大」图书馆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南京政府提出
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



1940年曾任延安鲁迅图书馆主任的高戈伍先生

延安市圖書館協會 召開第二次會員大會

【本報訊】延安市圖書館協會，於八日在中山園舉行第二次會員大會，報告半年工作，改選理事，並決定今後計劃，據悉第一屆會員大會，曾進行了以下工作：

調查延安各機關學校團體圖書館數目（約計十萬八千餘冊），了解各圖書館的情況，幫助提高工作質量，分月上採用了統一的新法。第二屆決定：適當的分配新到圖書，編延安圖書館總錄，再發行，補助各圖書館總員進行業務學習（教圖講習班）等。會上還由郭戈伍同志等七人報告新理事。

延安市圖書館協會，於八日在中山園舉行第二次會員大會，報告半年工作，改選理事，並決定今後計劃，據悉第一屆會員大會，曾進行了以下工作：

調查延安各機關學校團體圖書館數目（約計十萬八千餘冊），了解各圖書館的情況，幫助提高工作質量，分月上採用了統一的新法。第二屆決定：適當的分配新到圖書，編延安圖書館總錄，再發行，補助各圖書館總員進行業務學習（教圖講習班）等。會上還由郭戈伍同志等七人報告新理事。

《解放日报》关于延安图书馆协会第二次会员大会的报道（1942年2月11日）

鲁艺实验剧团成员在图书资料室阅览







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左）接受本书作者采访（1998年4月）



原延安鲁迅图书馆主任高戈伍（右）接受作者采访（1998年4月）



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周文骏先生（左）谈对本书的意见（1998年4月）



原毛泽东机要秘书高智（左二）接受课题组成员采访（1997年5月）



邵华将军（左）接受作者采访（1996年8月）

于光远先生题词

——代序

近年来读书的空气是浓厚起来了,但是图书馆事业仍然没有得到更多人所认识。今天图书馆的概念,应该扩大,除数量极大、仍然起着主要作用的各种出版物外,还包括显微胶片和胶卷、磁带和光盘等。图书馆事业是我国极为重要的事业。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今天看来,可以说小得不能再小,但是还是显示出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图书馆事业的重视。毛泽东给中山图书馆捐赠三百元,彭德怀捐赠二百元,就是证明。如果赖伯年同志的这本书,能够引起当今领导人和社会人士对我国图书馆事业更大的重视,他们的劳动就没有白费了。

于光远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七日

宛若平凡亦辉煌

——为《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序

文化部图书馆司司长 杜克

今年四月，我为筹建西安市图书馆的事赴西安期间，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图书馆赖伯年同志向我介绍了他们进行《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课题研究的情况，给我看了提纲和部分书稿，请我作序。说句实话，多年来忙于行政事务，自感对于学术研究渐次疏远，对这样的要求，一般接受得很勉强，为此也曾让一些朋友不快过。但这一次，只听了伯年同志的介绍，我就欣然答应了。为了陕甘宁边区这块光荣的土地，为了延安这个神圣的名字，我感到义不容辞。

及至回京后详细看完了提纲和书稿，我更感到这次承诺的应当与必要。我完全被书中所介绍的陕甘宁边区图书馆辉煌而动人的历史景象深深吸引住了。本书让我们了解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年亲自关心和支持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许多生动事例，接触到中共中央、边区政府关于图书馆工作的大量的历史性文献，真实地向我们展示了陕甘宁边区图书馆的历史全貌。我怎么也没想到，在那经济贫穷、文化落后、交通闭塞的黄土高原上，在面对日寇侵略、国民党封锁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边区的各类图书馆、图书室、民教馆竟达到 100 个以上。大至中央机关、干部院校的图书馆，小至

工厂、连队、农村、书店、医院直至保育院的图书室，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发展之迅速，工作之活跃，与同一时期沦陷区及国统区文化凋零、图书馆备受摧残的景况相比，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反差！怪不得当年曾令许多到过边区访问的国内外人士感到瞠目结舌，不可思议。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全国人民用小米加步枪打败日本侵略者和推翻蒋家王朝，在中国政治、军事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奇迹，那么，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事业及其它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则堪称中国文化史上另一个奇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无可置疑地是三四十年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一面光辉的旗帜，也是中国现代图书馆史上极为重要的篇章。对它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历史阶段。尽管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夺取全国政权，图书馆的建设只能局限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这块狭小而贫瘠的土地上。但实际上，由于延安当时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这里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政治中心，也是革命文化的大本营。从1935年10月到1949年全国解放期间，这里产生了包括从为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机关到最基层的民众服务的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图书馆。它远远超出了当时中国其它局部区域所具有的图书馆的数量与规模，是一个独立的红色政权中心所具有的各级各类图书馆的相当完备的集合。因此，对它的研究，绝不仅仅只有对一个地域的图书馆建设进行剖析的局部意义。从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中，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文化政策，反映了我党对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开创的无产阶级图书馆事业在那个历史阶段的整体发展水平。它对中共党史、边区政权建设史和中国现代文化史的研究都是

个必要的补充。

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是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直接领导和关怀下发展起来的,是革命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坚持革命文化的政治方向,紧密围绕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创造性地采取了各种实际有效的形式,为中央领导制定党的路线、指导中国革命战争服务,为传播马列主义理论、培养教育党的干部服务,为普及革命文化、宣传动员广大民众服务,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在办馆方向、办馆道路、服务方式、创业精神、工作作风等各个方面,都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或同一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其它图书馆,而体现出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鲜明政治特色,体现出革命圣地延安所特有的崭新的面貌和革命风格。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图书馆。它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图书馆事业的先河,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不仅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而且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它们为新中国的图书馆收集、保存了大量的革命文献,培养准备了一批革命的图书馆工作者,积累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工作经验。深入学习和研究这一时期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图书馆实践活动和有关的思想,学习和研究陕甘宁边区图书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办馆道路,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办馆形式,坚持艰苦奋斗的办馆精神等一系列经验,对推动新形势下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图书馆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陕甘宁边区的建立,距现在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当年亲自从事过边区图书馆建设的老一辈的图书馆工作者,至今健在者为数寥寥。借此机会,我向这些中国无产阶级图书馆事业的第一代开拓者

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我记得还是在 70 年代末期,新闻系统的一些老同志,痛感延安时期留下的新闻史料太少,健在人世的“活资料”也为数不多了,很有远见地提出了抢救新闻史料的问题。从 1979 年开始,他们组织了几个人,花了几年时间,编写了新闻工作大事记。图书馆系统开展此项工作,比他们晚了 17 年,“抢救资料”的任务显得更为严重和突出,自然也增加了很大的难度。想到这一点,我感到不无愧疚和自责。所幸的是,现在由伯年等同志完成了此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他们在不到两年时间内,查阅了上千万字的文献和档案资料,采访了上百个了解当时情况的老同志。从本书中所提到的一百多个图书馆(室)和一百多位工作人员的名录中,尤其是从对陕甘宁边区的五十多个图书馆的比较详细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课题组的成员付出了何等艰辛的劳动。伯年同志自承担课题以来,基本上没有休过节假日,每天晚上工作到深夜。为了集中时间和精力,他在今年春天辞去了行政职务。他的单位的领导给予了许多的关心和支持,为他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和时间保证。全国各地许多图书馆的领导和了解当时情况的图书馆前辈也给予课题组成员热情鼓励,纷纷提供资料或回忆介绍情况。正是由于课题组成员的努力和各方面的支持,使本来需用三四年时间才能完成的课题得以提前。从全书所运用的史料看,或查自建国前的报刊和原始档案资料,或从当年亲身经历的当事者处采访而得,资料翔实丰富,可靠性强,许多原始资料都是首次发掘面世的,确实具有“抢救资料”的意义。作者们不只是停留于对史料的简单收集和整理,而是在此基础上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图书馆学的理论,进行科学的概括和总结,从理论高度阐述了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事业的性质、特点、基本经验、历史影响及对新形势下发展图书馆事业的有益启示。这方面的研究,在我国图书馆界基本上尚属空白,本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深入研究与探索,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意义。

当然,陕甘宁边区图书馆的历史经验是极为丰富的。本书不可能详细无遗地反映当年边区图书馆的全部历史实践活动,一定还会有许多珍贵的史实与史料需挖掘、补充。在理论研究上本书也仅仅是个良好的开端,应该有更多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更为系统的深入研究。我们期待着本书作者和全国的图书馆同行们,继续坚持这方面的调查和研究,让陕甘宁边区图书馆这一段辉煌的历史,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彩。

怀着对革命圣地延安的敬仰与向往之情,在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的驱使下,很激动地写了以上的文字,仍觉得意犹未尽。赋七绝两首述怀:

颂陕甘宁边区图书馆

一

延安窑洞溢书香,远胜兰台枉度藏。
通览千年馆阁史,此篇才是第一章。

二

泥台木架洞清凉,马兰纸粗字生光。
勤为革命传真理,宛若平凡亦辉煌。

1997年11月于北京

谨以本书献给
当年在陕甘宁边区
默默无闻地
为中国革命
作出无私奉献的
图书馆工作者

.....



宏扬延安精神
发展图书馆事业

马文瑞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为本书题词